

浅谈互文性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的方法论启迪 ——以伪译研究为例

刘倩¹

[摘要]: 互文性理论和翻译研究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近年来发展迅猛,二者之间的联系也逐渐显露。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研究具有深刻的内在共通性,因此能够为对方提供方法论上的重要启迪。互文性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本质的理解,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在处理伪译这一翻译研究中的难题时,热奈特和哈蒂姆的互文性理论显示出很强的阐释力。与其花费功夫去对伪译的“原作”进行“证伪”,不如将伪译视为对真正的翻译文本在文本、体裁和话语层面进行的互文指涉。伪译通过将自己包装为翻译文学,切合读者的预期,在较为宽容的环境下对本国文学产生影响,对促进一国文学的革新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互文性 翻译 伪译 热奈特 哈蒂姆

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互文性理论和翻译研究在近几十年来都发展迅猛。互文性理论扎根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文学创造力的本质提出了全新的阐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文本与文本、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关系的认识。翻译研究则作为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成为跨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²事实上,这两个学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够互相促进、互相启发。关于这一点,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精辟的论述,³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尤其在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具体促进方面,尚缺乏详实而系统的阐释和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启迪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探讨了互文性理论能够为翻译研究中的一大难点——伪译研究——提供的理论依据和全新视角。

一、理论背景：互文性理论回溯

互文性理论最重要的阐释者莫过于法国文艺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她结合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研究成果,在《词、对话和小说》(1966)一

¹ 【作者简介】: 刘倩,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中西比较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当代英国文学。

² 参见吕黎:《互补和共赢——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的未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³ 国内的代表性研究包括王洪涛:《互文性理论之于翻译学研究:认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上海翻译》,2010年第3期;祝朝伟:《互文性与翻译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互文性”这个术语。在这篇文章中，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用拼贴起来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变。”⁴在克里斯蒂娃之后，罗兰·巴特进一步消解了“起源的神话”，⁵即“认为意义源自单个作者的意识，是单个作者的所有物，至少从形而上的角度上是这样。当现代的写作者写作时，他或她总是已经处于阅读和重写的过程中。意义不是来源于作者，而是来源于从互文的角度看待的语言。”⁶巴特的理论让文本从作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让人们认识到了文本生产的衍生本质。这并非要否认创造性的存在，而是要指出，创造性总是通过与其他文本进行互文性的互动而产生的。这种互动既包括一门语言以内的，也包括跨语际的。

如果说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更多地关注广义的文化，而非具体的文本，那么另外一些理论家则恰恰相反。⁷格兰汉姆·阿伦将包括热奈特和里法特尔在内的理论家所采用的方法称为“结构主义的方法”，指出“结构主义者相信批评能够定位、描述并固化文本的意义，哪怕该意义涉及到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⁸这些理论家将互文性概念作为文本分析的工具，将其用来“科学而精密地研究各种各样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反叛了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先锋文学观念，而与传统“渊源”文学研究相接轨。⁹应该说，这并非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否定之否定，臻于一种具有更丰富面向和更强大阐释力的研究方法。虽然结构主义的方法后来受到多方面的质疑，笔者却认为其方法在具体的文学分析中非常有用。这是因为与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有关符号学的抽象而艰深的理论相比，结构主义的理论为文学研究带来了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对于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

二、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总体性启迪

上文勾勒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脉络。自互文性理论兴起以来，它就对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翻译研究也不例外。互文性理论之所以能对翻译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根本原因是互文性所关注的现象与翻译实践的过程有着内在的共通性。互文性强调每个文本都指向其他文本和语境；而就翻译而言，译本总是不断地指向源语言文本，同时不断指向源语言及译入语中的其他文本及语境。互文性理论强调一切文本都是通过或隐或显地引用或指涉先前文本来构成自身；而就翻译而言，翻译活动是将用源语言写作的文本的意思、风格和情感搬运到译入语中，构成翻译文本。在两种情况下，先前的作品的一部分都被提取出来，进行了变型、转换，然后融入到新的文学文本中去，并构成新的文本，而创造性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一般而言，这两个文本生产活动的区别在于，翻译需要有跨语际的

⁴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Trans.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ez, Oxford: Blackwell, 1980, p.66.

⁵ Roland Barthes, *Image Music 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London: Fontana Press, 1977, p.148.

⁶ Graham Allen, *Intertextu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74.

⁷ Ibid.

⁸ Ibid., p. 97.

⁹ 钱翰：《论两种截然不同的互文性》，《学术论坛》2015年第2期。

转变，而互文可以在一门语言内部发生。然而，倘若我们研究的历史阶段恰好见证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因此产生了许多跨语际的互文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和互文的距离就大大缩短了。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当时的许多作家从外国作品中引用文段，有的从译本中引用，有的直接从原著引用。比如，在郭沫若的诗歌和郁达夫的小说中，人们常常能读到用外文直接引用的外国文学作品。¹⁰这些引用的文段在进入中国文学文本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构成了中国文学文本。这便是跨语际互文的典型例子。

倘若跨语际不再构成翻译与互文这两种文本生产模式之间的区别，那么二者仅剩的区别就是借用的规模了。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翻译比互文借用了更多先前文本，因为翻译不言而喻是对一部或一篇作品的整体借用。然而，即使这最后的区别有时也被消解了。在翻译史上的某些时刻，译者可能会随意改动原著，以至于译著事实上成为译者的创作，很难判断到底是从原著借用来的内容更多，还是译者自己添加的内容更多。¹¹由此可见，翻译与互文之间的界线即便存在，也是非常模糊不清的。Theo D'haen 甚至指出，翻译与互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提出，翻译可以被视为互文的一种，即“受束缚的互文” (bound intertextuality)，因为相对于一般的互文性关系，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两个文本（即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又并非如理想化的绝对忠实的“翻译”中的两个文本的关系那样紧密。¹²也就是说，绝对忠实的“翻译”需要译文与原文在意义上完全一致，但这种“翻译”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翻译一定意味着译文与原文有所出入，因此可以被视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互文。而翻译毕竟是依照原来来构造译文，所以是受到束缚的。

基于互文和翻译的内在共通性，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能够相互深化、相互促进。虽然人们较少讨论翻译研究对互文性理论的启迪，但事实上，翻译研究对于深化互文性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主要在于翻译研究对跨文化和跨语际问题的关注有助于深化互文性理论。翻译往往涉及两种以上语言，而互文则不一定。虽然研究者们用互文性理论探讨西方作家对荷马 (800BC-701BC) 或维吉尔 (70BC-19BC) 的借鉴，却很少从跨语际和跨文化的角度来进行讨论。翻译研究则具有相对更成熟的理论框架来探讨跨越语言鸿沟的文本旅行及其意义。例如，翻译研究提出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可比性”或者“同质性”的问题，这就加深了我们对文本借用的理解。¹³正如 Christina Schäffner 所指出，翻译为互文性研究提供了跨文化的维度，

¹⁰ 比如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的第一首《女神之再生》的开头就用德文原文引用了歌德的诗歌，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页；又如，郁达夫在短篇小说《银灰色的死》中大量引用了外文原文，参见郁达夫：《银灰色的死》，《郁达夫小说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15页。

¹¹ 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文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翻译与创作的界限非常模糊。有关当时的译者对原著的改写，学界已经有较多的论述，参见王洪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¹² Theo D'Haen, "Antique Lands, New Worl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tertextuality, Translation,"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43.2 (2007): 107-120.

¹³ Wolfgang Behr, "Kingsmill's *Shijing* Translations into Sanskrit and the Very Idea of 'Congenial Languag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17-19th centuries: archives and context," SOAS, 19-21 June 2013.

因此为拓展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的话语关系做出了贡献。¹⁴

相应的，互文性理论同样为翻译研究带来重要的启迪，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首先，互文性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翻译过程的理解。韦弩蒂指出，“[翻译]实际上涉及三组互文性关系：(1) 外语文本与用该外语或其他语言写成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2) 外语文本与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人们传统上通过等同性概念处理这层关系；(3) 翻译文本与用译入语或其他语言写成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¹⁵ 同样，Eleonora Federici 提出了“译者的互文性包袱”的概念，指的便是译者“自身的‘位置’和身份政治带来的互文性的文学、语言学和文化的‘包袱’，这个包袱在译者的翻译行为和将源文本改写成目标语文本的过程中无处不在。”¹⁶ 正如韦弩蒂和 Federici 所指出，互文性理论进一步消解了等同性的概念，使得原著和译著都不再是静止的、自明的存在。两个文本唯有通过与其他文本发生关系，通过译著对原著的指涉，才能具有意义。将互文性理论融入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传统上将翻译过程视为原著、译者和译著这三个对象的观念，而是将翻译理解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翻译既包括原著、围绕在原著周围的其他文本和语境，也包括对原著进行解读和质疑的译者，还包括译著和围绕在译著周围的其他文本和语境。因此，现在人们要考虑的不再是三个对象，而是三重关系。

其次，互文性理论能够深化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介绍一下热奈特有关“跨文本性”的观点。同里法特尔一样，热奈特也被人们归为“结构主义”互文性理论家。而他的理论对于翻译研究，尤其是伪译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他提出了“跨文本性” (transtextuality) 的概念，用来指代“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或隐或显的关系”。¹⁷ 事实上，热奈特的“跨文本性”同里法特尔等人所说的“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含义是近似的。他把“跨文本性”分为了五大类：

1)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此处互文性的含义比克里斯蒂娃或者里法特尔的“互文性”要狭窄得多，主要是指引用或者剽窃的行为。

2) 副文本性 (paratextuality)：副文本是指附属与主要文本的那些次生内容，比如题目、序言、标注等，这些副文本为主要文本提供了语境。

3) 元文本性 (metatextuality)：指一个文本通过对另一个文本进行评论而与之产生联系，但是并不一定是通过引用的方式。

4) 超文本性 (hypertextuality)：这是热奈特论述的重点。指除了评论关系之外的，将后来文本，即超文本 (hypertext) 与先前文本，即潜文本 (hypotext) 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关系。

¹⁴ Christina Schaffner, "Intercultural Intertextuality as a Translation Phenomenon," *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 3 (2012): 345-364.

¹⁵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on, Intertextuality, Interpretation," *Romance Studies* 27. 3 (2009): 157-173.

¹⁶ Eleonora Federici, "The Translator's Intertextual Baggage,"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43. 2 (2007): 147-160.

¹⁷ Gérard Genette,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Trans. Channa Newman and Claude Doubinsk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p. 1.

5) 统文性 (architextuality) : 指文本的文类 (genre) 属性。¹⁸

笔者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对热奈特的跨文本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是因为在他的分类中,有两类跨文本性对翻译研究格外重要,那就是超文性和统文性。热奈特认为,作为超文本的译文是从作为潜文本的原文发展出来的,因此,翻译活动的本质是构建起译文与原文的超文关系。¹⁹热奈特的这一分类对于我们理解伪译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在下一节中会对此进行说明。

最后,互文性理论有助于凸显译者的主体性。正如巴特所指出,在文本产生意义的过程中,读者基于自己的阅读经验,将文本与自己阅读过的其他文本相联系,同时与文化语境相联系,最终使文本产生意义。而在翻译的时候,译者首先是一位读者,是一位身份特殊的读者,他需要对源语言文本与该语言内部的其他文本的互文进行理解。这些存在于译入语中的文本和语境使译著产生意义。因此译者的角色也是斡旋者和阐释者,其主体性是显著存在的。互文性理论对读者的关注有助于我们认识作为读者的译者的主体性。不过,译者的主体性也受到其自身文化的限制。Federici 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译者就像一个好奇的旅行者,他在一个崭新的、未知的文学世界旅行,在这场旅行中,他“在一张未曾被探索过的地图上找寻许多暗示,找寻新的路径,而他在阅读这张地图时必然透过自己文化的镜片。”²⁰也就是说,译者在解读原著与源语言文本的互文性现象时,必然会受到译入语文化的限制,不一定能充分并恰当地理解这些互文性现象,而是在理解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掺入了自己阅读经验和文化背景带来的新的互文性因素。

三、互文性理论对伪译研究的启迪

以上论述了互文性研究对翻译研究的总体性启迪。这些启迪主要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翻译的本质及其特点。但是,互文性理论在操作层面,到底能为翻译研究提供哪些帮助?它能有助于我们解决哪些具体的翻译研究的难题?学术界现有的研究对此关注得还是不够的。下文将就互文性理论能给予翻译研究中的伪译研究的启迪进行重点分析和论述。

伪译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无法绕开却又让研究者们颇感头疼的问题。就国外而言,迄今为止,Emily Apter、Michael Gibbs Hill、Anton Popović、Gideon Toury、Douglas Robinson、Susan Bassnett、Ronald Jenn、David Martens and Beatrijs Vanacker 和 Brigitte Rath 等学者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研究。²¹尤其在近一两年,国外学界给予了伪译现象很高的关注,这以比利

¹⁸ Genette, *Palimpsests*, pp. 1-5.

¹⁹ Genette, *Palimpsests*, pp. 212-214.

²⁰ Federici, "The Translator's Intertextual Baggage," pp. 147-160.

²¹ 参见 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Michael Gibbs Hill, "No True Men in the State: Pseudo/translation and 'Feminine' Voice in the Late Qing."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 Xiandai Zhongwen wenxue xuebao* 2011, 10(2): 125-148;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Douglas Robinson, "Pseudotranslation,"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 by, Mona Baker, 183-185. London: Routledge, 1998.; Ronald Jenn, *La pseudo-translation, de Cervantès à Mark Twain*, Peeters Publishers, 2013;

时鲁汶大学的一批青年学者为代表。²²但是总体来说，伪译研究在国外的翻译研究学界仍然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在国内，有关伪译的研究是非常稀少的。在《中国知网》上以“伪译”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2003年至今只有23篇论文，以“伪翻译”为关键词搜索，从2003年至今只有16篇论文。²³这么重要的翻译问题，研究成果却如此之少，不能不说从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伪译研究的难度。什么是伪译？图里（Gideon Toury）在《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他》一书中将伪译（pseudotranslation）或者虚假的翻译（fictitious translation）定义为：“以翻译的面貌呈现出来的文本，而在其他语言里从未存在过相应的源文本，因此不存在事实上的‘转换操作’及翻译关系。”²⁴图里对伪译的定义紧接着带来的问题就是：要发现“原著”有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确认某部“原著”是存在的，这是很容易的，然而要宣布某部“原著”是不存在的却很有难度，因为文学史上有无数不起眼的作品和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他们的身份和笔名早已为人们遗忘。证实容易，证伪却难。因此研究者要宣称某部翻译作品没有对应的原著，这是很难的事情。即使这样一部原著从不曾存在过，是否有类似的作品？“译者”又会不会从多个文学作品中各取一部分，杂糅成一部作品？²⁵这些问题令研究伪译的学者们深感困扰。

有学者认为，伪译和真实的翻译具有相同的文化和历史功用，因此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从文化功能上看，伪译/伪著只是后世研究者通过考证得出的结论，而在当时，它们被作者有意充当译作/著作，被读者以译作/著作的角色来接受，因此，它们和真正的译作/著作一样，对该国文化和文学的演进起到了相同的功能。”²⁶然而，虽然伪译和真正的翻译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相似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它们从根本上来说是迥异的文本生产模式。诚然，伪译的发现往往是很多年后的事情，而伪译与真实的翻译在当时所起到的功用并非完全相同。这是因为伪译往往是充斥着本土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特点，与真实的翻译背后的异国意识形态与诗学特点截然不同，因此，伪译在当时的功用是受到“译者”操纵的。伪译的作者对文本的操纵要比真正的译者对文本的操纵更为直接。²⁷所以，简单地将伪译和真正的翻译视为效果相同的文本来研究，并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那么，我们该怎样探讨伪译呢？笔者

David Martens and Beatrijs Vanacker, "Scénographies de la Pseudo-translation", in *Les Lettres Romanes*, vol. 67, No. 3-4, pp. 347-358; Brigitte Rath, "Pseudotranslation", in *ACLA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deas of the Decade*. 2014.

²² 任教于鲁汶大学的 Tom Toremans、Beatrijs Vanacker、David Martens 等青年学者近年来对伪译现象非常关注，不仅发表了一些单篇论文，还于2016年11月在他们主办的期刊 *Interférence Littéraires* 上出了一期有关伪译的专刊，刊名为“Pseudo-traductions”。http://www.interferenceslitteraires.be/nl/nr19_17/3/2017.

²³ 以上为笔者2017年3月10日搜索的结果。

²⁴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 40.

²⁵ 就连图里本人也承认：“可能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伪译，人们尚未解开它们的谜题，并可能永远无法解开。这些文本只能被视为源文本未知的翻译；但是即便如此，有许多真正的翻译也有着相同的境遇，人们无法将二者真正区分开来。” *Ibid.*, pp. 40-41.

²⁶ 胡翠娥：《不是边缘的边缘——论晚清小说和小说翻译中的伪译和伪著》，《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²⁷ 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者认为文学翻译受到各种规范和机制的操控。关于翻译研究的操控理论，参见 Theo Hermans,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5，以及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认为,互文性理论——尤其是热奈特与哈蒂姆两位学者的互文性理论——为我们认识和分析伪译现象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框架。

虽然热奈特本人对翻译实践的探讨并不多,但是他有关超文性、副文性和统文性的论述都能非常有效地阐释伪译现象。上面提到,热奈特认为在一般的翻译活动中,译文与原文构成了超文性的关系。那么,由此申发,伪译则与真正的翻译构成超文的关系。伪译通过对真正的翻译(即潜文本)进行模仿,而成为它的超文本。那么伪译是如何模仿真正的翻译的呢?这里我们要谈到热奈特提到的五种跨文本性关系之间的交叉重叠。他指出,这五类超文本性关系并非相互独立的,而彼此之间存在着重要而丰富的交叠。比如,历史上,指涉文类归属的统文性往往是通过副文本提供的线索而得以确定。²⁸换言之,读者如何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这部作品是一部翻译?往往,人们是通过“某某译”或者“译者序”这样的副文本才能够得知。伪译恰恰是模仿了真正的翻译的这种统文性特点,在自己身上标记与之相近的副文本内容,才得以将自己伪装成真正的翻译。

热奈特的论述与英国翻译理论家巴兹尔·哈蒂姆有关互文指涉的论述存在内在的契合点。哈蒂姆把互文指涉分为“社会文化实践”和“社会语篇实践”两个层面,前者指的是包括制度惯例、风俗习惯、生存方式等在内的社会文化对象,在发生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差别,后者是指文化成员通过“对其自然使用的语篇或对所读语篇进行思考”来定义自己的文化。²⁹哈蒂姆又将社会语篇实践分为语篇、体裁和话语三个类别。³⁰语篇(text),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本,是指“实现特点修辞目的(如议论、叙事等)的一系列连续的语句”。体裁(genre)是指“以常规方式表达语言的特定语篇行为。这些语篇行为适用于特定的社会场合,满足该场合中参与者的目的(如读者来信、新闻报道等)”。话语(discourse)是指“人们使用语言时的态度表达方式,以及语言如何以常规方式代言社会习俗(如男性至上主义,女权主义等)”。³¹

如果说真正的翻译中最重要的互文指涉是在文本层面上指涉源语言的文本,那么伪译则同时在文本、体裁和话语层面指涉真正的翻译文学。首先,伪译可能会引用或盗用真正的译本中的字词、专有名词、语句甚至段落。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伪译也会对特定的话语进行指涉,即为了借助外国作品所代表的某些话语而将自己包装成翻译作品。但是,伪译对真正的译本最重要的借鉴是在体裁层面的。伪译可以被视为在体裁层面指涉“翻译文学”这种文类,因为伪译作品无时无刻不在以当时流行于世的翻译文学为模仿对象。为了将自己呈现为翻译作品,伪译的封面上往往会出现“某某著”、“某某译”的字样,往往会提供一篇“译者序”或者“译者按”。用热奈特的术语来说,就是提供了指涉“翻译”这种文类的副文本,从而使其自身具有

²⁸ Genette, *Palimpsests*, pp. 7-8.

²⁹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7页。

³⁰ 哈蒂姆的这三个概念又分别取自前人的研究。“体裁”来自克雷斯(Kress)，“话语”来自福柯，“语篇”来自博格兰德和德雷斯勒(Beaugrande & Dressler)。参见王树槐、王群:《哈蒂姆的互文性翻译理论:贡献与缺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³¹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翻译文学”这种统文性。

为了更好地说明伪译文本对翻译文本在文本、体裁和话语这三个层面的互文指涉，下面我将以民国时期的三部作品为例，分别对这三种互文指涉进行说明。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时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翻译文学的数量甚至一度超过了创作作品。³²读者对翻译文学的需求也非常高，都渴望从翻译文学中了解外国文学和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伪译作品也应运而生。许多著名作家和翻译家都承认他们曾经创作过伪译作品，比如周瘦鹃曾经坦陈自己喜欢杜撰，写了不少伪译作品：

“余为小说，雅好杜撰，年来所作，有述西事而非译自西文者，正复不少。如〈铁血女儿〉、〈鸳鸯血〉、〈铁窗双鸳记〉、〈盲虚无党员〉、〈孝子碧血记〉、〈卖花女郎〉之类是也。盖译辄为原文所束缚，殊苦其不自由，自着则又病吾国事情多枯燥乏味，言情之作，直是千篇一律，用是每喜杜撰，随吾意想所至，笔之于书，颇觉醇醇有味。”³³

显然，伪译的创作过程给周瘦鹃带来了相当大的愉悦感，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包括吴趼人在内的其他一些作家也很享受这一特殊的创作过程。那么，伪译是如何实现自我伪装的呢？笔者认为，通过将伪译对翻译作品的互文指涉分成文本、体裁和话语这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论述，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探讨伪译文本的本质和特性。

1. 文本层面的互文指涉

以写作《二十年之怪现状》（1903）闻名于世的吴趼人曾经写过一篇名为《预备立宪》的小说。在这篇小说的序言中，他写道：

“恒见译本小说，以吾国文字，务吻合西国文字，其词句之触于眼目者，觉别具一种姿态，而翻译之痕迹，即于此等处见之。此等词句，亦颇有令人可喜者。偶戏为此篇，欲令读者疑我为译本也。”³⁴

从序言可以看出，吴趼人试图使读者误认为这篇小说是翻译之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预备立宪》可以被视为伪译。吴趼人对翻译小说的“词句”进行了模仿，或者说是一种戏仿，使之故意彰显出“翻译之痕迹”。具体而言，在当时，许多从日文翻译或者转译的小说都会用中文的“之”字来直接取代日文的所属代词“*の*”，这即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日文习气”。³⁵不仅在翻译日文小说时如此，当时的人们在翻译西方文学时，也时常大量使用“之”字，因为英

³² 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页。

³³ 周瘦鹃：《断头台上》，《游戏杂志》1914年第5期。

³⁴ 吴趼人：《〈预备立宪〉弁言》，《月月小说》1906年第2号。

³⁵ 胡翠娥：《不是边缘的边缘——论晚清小说和小说翻译中的伪译和伪著》，《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文、法文等西欧语言都常用多个修饰语来修饰一个名词。吴趼人在这篇小说中大量使用了“之”字用法，以至于比一般的真正的翻译作品中使用频率还要高。在此，《预备立宪》对真正的翻译小说进行了文本层面的互文。吴趼人显然对当时流行的翻译文学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反思，尤其洞察了其句法和词法方面的特点，由此才能实现对翻译文学的有效的模仿，将伪译作品以翻译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

如果说吴趼人对翻译作品的互文指涉主要集中于对句法和词法的模仿，那么另一些作家则通过引用（quotation）和暗指（allusion）的方式对翻译作品进行互文指涉。这些作家无疑在创作伪译作品之前已经阅读过为数不少的翻译作品，所以会通过引用或谈及与之相关的内容来加强其伪装效果。周瘦鹃的《绿衣女》（1913）是一篇短篇小说。在该小说发表两年之后，周瘦鹃亲口承认这是一部伪译之作。³⁶小说讲述了在莫斯科附近的小村庄里，一个侠女神秘现身，劫富济贫，为父报仇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人们能够发现许多对当时流行的翻译文学的引用和暗指。其中，最为明显的指涉对象就是林纾翻译的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当描绘绿衣女的外貌时，周瘦鹃写道，她总是在头发上插着一朵红茶花。在她桌上的花瓶里，也总是插着一些茶花。³⁷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1899年出版以来风靡一时，周瘦鹃对林译小说的痴迷是人们有目共睹的，³⁸并且无疑读过这部小说，所以通过对茶花的指涉，周瘦鹃对《巴黎茶花女遗事》进行了文本层面的互文指涉。

除此之外，《绿衣女》还对清末民初以来大量译介过来的虚无党小说进行了互文指涉。自从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吸引，他们的活动也经常出现在当时中国的报纸上。因此，西方许多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说被译成了中文，这些革命者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和神秘莫测的特点受到当时不少人的推崇。³⁹根据学界的研究，周瘦鹃也受到虚无党小说的吸引，常常阅读译介的虚无党小说。⁴⁰在《绿衣女》中，女主人公绿衣女正是一位虚无党人。在她居住的小屋里挂着俄国著名女虚无党人苏菲亚·彼罗夫斯卡亚（Sophia Perovskaya, 1853-1881）。而在整个故事中，绿衣女不断地被村人与苏菲亚相提并论。有关苏菲亚等虚无党人士的作品在清末民初被大量地译介，普遍读者对他们都有所耳闻。因此在作品中提及苏菲亚，很容易就让读者联想到当时译介的作品，尤其是有关“虚无美人”——即视死如归、貌美如花的女虚无党人——的故事。⁴¹此外，绿衣女有几本最珍爱的著作，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这个书目和梁启超在当时提出的重要的虚无党小说的书目非常接近。⁴²

³⁶ 周瘦鹃：《珠珠日记》，《礼拜六》1915年第73期。

³⁷ 周瘦鹃：《绿衣女》，《妇女时报》1913年第9期。

³⁸ 陈建华：《抒情传统的上海杂文：周瘦鹃言情小说与欧美现代文学文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1卷第6期。

³⁹ 潘少瑜：《想象西方：论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编译论丛》2011年第2期。

⁴⁰ 马兵：《亡国想象与虚拟西方——论周瘦鹃小说的半殖民书写》，《东岳论丛》2015年第36期12卷。

⁴¹ 罗列：《20世纪初叶中国虚无党小说及“虚无美人”译介风潮研究》，《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1月。

⁴² 潘少瑜：《想象西方：论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编译论丛》2011年第2期第10页。

由此可见，同吴趼人一样，周瘦鹃对当时流行的翻译小说的特点非常熟稔，对其进行了文本层面的互文指涉。《绿衣女》中随处可见的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虚无党小说的暗指和引用，都使得这部小说在外表上接近翻译小说，容易蒙混过关。

2. 体裁层面的互文指涉

伪译对真正翻译作品的最重要的互文指涉是在体裁层面。翻译文本具有自身的特征和风格，借用热奈特的话说，这是一种统文性，往往借助副文本得以显现。为了将自身呈现为翻译文本，伪译文本的作者们势必要模仿翻译文本的体裁特征，因此，可以说，体裁层面的互文指涉是伪译文本最本质的属性。

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艾米丽·阿普特尔 (Emily Apter) 在探讨伪译时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比喻。她认为伪译就好比文本克隆 (textual cloning)，通过基因编码 (比如 DNA) 将文本制造出来。她提出，应该用“文本克隆”一词完全取代过去惯用的“伪译”这个术语，因为人们在谈及“伪译”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鉴别真伪上，而“文本克隆”一词则让人们看到伪译文本生产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对翻译的本质拥有全新的理解。⁴³事实上，阿普特尔的“文本克隆”正是指伪译对翻译作品在体裁层面的互文，都是在探讨伪译如何从其同时代的翻译作品的细胞里“自我再生”出来。⁴⁴

不难发现，伪译作品会模仿翻译作品，在封面、扉页等处将自己标榜为“翻译”，并提供原作的作者名、书名。这些有时会以原文的形式呈现。伪译作品有时还会提供“译者序”或者“原作者来信”等副文本材料，来包装自己。比如，上面提到的周瘦鹃的《绿衣女》就用简短的译后记中提供了原作的英文名称“The Maid in Green Gown”，还提供了原作者名字的音译名“亨梯尔”。周瘦鹃在译后记中谈到自己一直喜欢绿林好汉的故事，以及自己在旧书摊上偶然找到这本书的经过。他甚至还请求读者原谅自己翻译水平有限，以至于丧失了原著的生动色彩。⁴⁵这些谦虚的话语恰恰符合当时翻译界流行的做法，林纾、包天笑等人都常常在译者序中自谦。周瘦鹃通过模仿这些翻译文学特有的做法，将《绿衣女》包装成了一部翻译作品。

3. 话语层面的互文指涉

出版于 1903 年的小说《自由结婚》据说是由一位叫自由花的译者翻译的。⁴⁶然而，后来的研究者们发现，这篇小说是张肇桐 (1881 ? -1938)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时候所作。这部伪译作品无疑没有对应的源语言文本，是张肇桐的创作。⁴⁷这部典型的伪译作品无时无刻不在指涉当时流行的翻译文学。

⁴³ Apter, Emily. 2006.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221.

⁴⁴ *Ibid.*, p. 213.

⁴⁵ 周瘦鹃：《绿衣女》，《妇女时报》1913 年第 9 期。

⁴⁶ 自由花：《自由结婚》，上海：自由社，1903 年。

⁴⁷ 有关《自由结婚》的详细讨论，参见 Hill, “No True Men in the State,” pp. 125–148.

首先，在体裁层面，张肇桐和周瘦鹃等人一样，对翻译文学的体裁进行了模仿。他不仅提供了“原著”的英文题目，还提供了作者的英文原名。他声称原著的英文名称叫 Free Marriage，原作者是一位叫做 Vancouver 的犹太老人。⁴⁸他甚至还提供了一封英文写的“原作者”的来信。这些内容都属于热奈特所定义的副文本，由此呈现了伪译文本的统文本属性，或者说哈蒂姆所论述的体裁归属。《自由结婚》通过由此将自己伪装成翻译文学。

其次，在话语层面，由于清末民初中国上上下下弥漫着救亡图存的氛围，许多来自于东欧等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被译为中文，其内容大多数与民族存亡的经历相关联。《自由结婚》在内容上指涉这些翻译文本，从而让读者不容易怀疑其真实出处。《自由结婚》的爱国主题可谓呼之欲出。主人公给自己起名“黄祸”，从而激励自己为了救国图强而奋斗。女主人公投身革命事业，甚至加入了一支救国女子军。作者将作品伪装成出自一位犹太作家之手，这样一来，犹太人亡国的历史就会为小说增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因此更能起到警醒同胞的作用。由此，可以认为，《自由结婚》除了在体裁层面对当时通行的翻译文学进行互文指涉，还在话语层面对清末民初的救亡图存话语进行指涉。自从梁启超提出用小说来救国，并从日本文学中选取爱国进步的政治小说进行翻译，许多政治小说被译为中文。这些翻译政治小说构成了有关“救国”、“爱国”、“图强”、“进步”等一系列话语，而《自由结婚》通过对这一系列话语进行指涉而实现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以上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了伪译的互文本本质，即伪译通过对翻译文学的文本、体裁和话语进行指涉来构成自身。下面我将从读者的角度来探讨伪译得以蒙混过关的原理。互文性理论对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互文性理论认为，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脑海里都对自己即将阅读的文本有着既定的预期。当他们阅读文本时，会将文本归类为“与之相似的其他文本” (other texts of this kind)，说到底，也就是通过与此前阅读过的其他文本建立互文联系，来进行理解和阐释。⁴⁹读者之所以能辨识出不同文本的类别，正是因为他们对文本有着“模式化的预期”(patterned expectations)。他们凭借这种预期才能辨别科技论文和报刊文章，才能区分宣传文章和新闻报道。⁵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部作品以译作的面貌问世，在读者开始阅读之前，他们会以为自己将阅读一部翻译作品，于是带着阅读翻译作品的预期进行阅读。伪译由于对翻译作品进行了体裁和话语层面的互文指涉，会恰好符合读者的预期，因此达到伪装的效果。这便是为什么诸如《自由结婚》一类的作品能够在当时成功地蒙混过关，许多年后才被研究者们用考证的方式、或者由作家自己承认，而揭示其真实身份。

那么，伪译对于一国文学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有人会认为，伪译并非真实的翻译，因此价值不高。但是事实上，虽然伪译作品的大部分可能都是作者自己的创作，但与此同时，作

⁴⁸ 胡翠娥：《不是边缘的边缘——论晚清小说和小说翻译中的伪译和伪著》，《中国比较文学》2003 第 3 期。

⁴⁹ Albrecht Neubert and Gregory Shreve, *Translation as Text*, Kent, Ohio and London, England: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7.

⁵⁰ *Ibid.*, p. 123.

者可能从一个或多个西方文学文本中借用了只言片语，在文本层面进行了互文指涉，并且在体裁和话语层面进行了互文指涉。伪译作者对外国文本元素的取舍受到他对外国的想象的制约，取决于他所阅读过的外国作品或者翻译作品。⁵¹与此同时，伪译的作者必然受到本土的文学传统的潜在影响，对本土文学文本、体裁和话语进行互文指涉。这些多层面、多方向的互文指涉在伪译文本中构成了新的文本特征，并造就出新的混合性的文本风格，使之不再能轻易地被本土文化所涵盖。所以，伪译同翻译一样，能够为一国文化的更新做出贡献。

如果说，翻译作为一种“次级文本生产模式”（a secondary mode of text-generation）⁵²，在引进新事物时更不容易受到译入语文化的抵抗和非难，那么伪译作为翻译面具保护之下的创作，则同样能够获得译入语文化读者的包容。⁵³这在图里看来正是伪译存在的原因之一。伪译作者有时会为了引入新事物、新思想、新情感而将自己的创作伪装成翻译。而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显得尤为明显。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文学的翻译成为一时间最受欢迎的阅读材料，因为人们渴望从中学习新的社会制度，来改良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借用伪造的“翻译”身份，托名于外国作家和作品，来表达激进的、有违传统道德伦理的新观念和新价值观，无疑是更为安全的。

四、结语

互文性理论在近几十年来迅猛发展，在西方已经有了很多杰出的研究成果，有关其对翻译研究等领域的启迪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扩充，尤其是关于互文性理论能够在具体的翻译研究中发挥怎样的功用，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本文探讨了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总体性启迪，及其对伪译研究能给予怎样的推动。可以说，对于伪译研究这一翻译研究中相当棘手的难题，互文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解决途径，让我们既能从本质上认识伪译研究的互文性特点，又能对伪译的形成和接受进行有效的阐释。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还有待学者们日后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⁵¹ 潘少瑜：《想象西方：论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编译论丛》2011年第2期。

⁵² 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Studies*, Eds. James S Holmes, José Lambert and Raymond van den Broeck. Leuven: Acco, 1978, pp. 117-127.

⁵³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p. 41.